

黄新宪 主编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台湾教育 的历史转型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新宪 主编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台湾教育 的历史转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黄新宪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271 - 6

I. ①台… II. ①黄… III. ①教育改革—研究—台湾省 IV. ①G5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909 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张志全

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

黄新宪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83,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271 - 6/G · 1361

定价 28.00 元

撰 稿 人

黄新宪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绪 论
滑文革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	第 一 章
陈 征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 二 章
杨 清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硕士	第 三 章
秦 芬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硕士	第 四 章
刘辉雄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	第 五 章
郑 芳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	第 六 章
姚 静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硕士	第 七 章
林善栋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	第 八 章
张 蓉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硕士	第 九 章
吴丽仙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	第 十 章
杨晓斌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第十一章
李清华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	第十二章
颜 禾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	第十三章
田志馥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硕士	第十四章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台湾的教育观念	(14)
一、从殖民教育向政治功利主义教育转型	(14)
二、从政治功利主义教育向经济功利主义教育转型	(18)
三、从经济功利主义教育向现代教育提升	(22)
第二章 台湾的教育制度	(31)
一、教育行政制度从“意志权力”向“规则权利”转型	(31)
二、学校制度从“局部”功能向“全方位”运作转型	(36)
三、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从“统筹统支”向“编列审议”转型	(42)
四、教科书制度由“统编制”向“审定制”转型	(46)
第三章 台湾的教育行政	(50)
一、教育行政组织由三级向两级转型	(50)
二、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由集权向分权转型	(55)
三、教育行政决策运作由在地化向全球在地化转型	(60)
四、教育行政事务处理模式由自办向委办转型	(64)
第四章 台湾的幼儿教育	(70)
一、幼教目标由社会本位向幼儿本位转型	(70)
二、幼教管理模式由经验式向规范化转型	(74)
三、幼教师资由保育型向专业化转型	(77)
四、办学模式由单一向多样化转型	(82)
第五章 台湾的中小学教育	(87)
一、从强调训育向培养适用人才转型	(87)

二、从培养适用人才向普及提高转型	(92)
三、从普及提高向均衡发展转型	(96)
四、从均衡发展向多元整合转型	(100)
第六章 台湾的师范教育	(106)
一、师范教育层次从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型	(106)
二、师范教育体系由封闭定向向多元开放转型	(108)
三、师范教育理念从“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	(111)
四、师范课程体系从“专业化”向“一体化”转型	(116)
第七章 台湾的职业教育	(123)
一、从以初职为主向以高职为主转型	(123)
二、从以高职为主向以专科为主转型	(130)
三、从以专科为主向以本科为主转型	(134)
第八章 台湾的成人教育	(140)
一、从补偿性教育向职业培训、进修转型	(140)
二、教育方式由传统向远程转型	(144)
三、成人教育体系由零散向有序转型	(147)
四、由有限的阶段性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型	(150)
第九章 台湾的高等教育	(156)
一、从学究型向兼顾社会服务功效转型	(156)
二、从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转型	(158)
三、从管制向开放转型	(166)
四、从数量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	(170)
第十章 台湾的留学教育	(175)
一、公费留学由制度化向弹性化转型	(175)
二、自费留学由精英化向普及化转型	(181)
三、留学生辅导工作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	(186)
第十一章 台湾的少数民族教育	(194)

一、山地化教育向平地化教育转型	(194)
二、平地化教育向整体融合教育转型	(199)
三、融合教育向多元化教育转型	(203)
第十二章 台湾的科学教育	(210)
一、单一精英教育向全面科学教育转型	(210)
二、课程教材从模仿引进向自主发展转型	(214)
三、培养方式由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型	(218)
第十三章 台湾的国文教育	(225)
一、回归汉语与沿袭传统	(225)
二、调整标准与改进教法	(230)
三、突破陈规与超越现状	(236)
第十四章 台湾的道德教育	(246)
一、德育的集体认同与社会的整合	(246)
二、传统伦理道德内涵的现代转化	(250)
三、德育的去政治化及回归社会生活	(253)
四、德育价值取向的本土化、多元化与人本化	(255)

绪 论

台湾教育转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内容涉及教育的许多门类,对台湾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从多个层面探讨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分析其产生的成因,探讨其转型的主要特点,总结其中蕴含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认识台湾教育的发展进程,这对于丰富海峡两岸社会的教育体验具有深刻意义。

探讨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必须同时认识教育转轨、教育过渡、教育转型和教育的现代性等概念。从社会转型理论出发,结合台湾教育实践,我们认为,教育转轨源自一个基本的社会转型概念,取自转车换乘的意思,指随着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而引起教育的变革与转换。过渡则是对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提供的一种描述和解释,即“转车换乘”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教育过渡也是如此。既然是“转轨”、“过渡”,那就暗示着有一个潜在的彼岸,这就需要进一步解释“去哪里”,“对岸在何方”,“结果会怎么样”,转型是否有一个既定的模式等问题。^①至于教育转型,指随着社会转型,教育所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改革和发展,是在冲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层面上强调“改”,更强调“变”和“转”的过程。具体而言,指通过教育规范体系的整体性变革,改变教育内部的实体和关系结构,转换教育内外部功能,使教育获得新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教育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具有承继传统而演化的意味。先有旧型,才有转旧为新的可能。就台湾教育转型的历史进程来看,一般来说,随着台湾社会转型的发生,教育必然发生转型性改革,这也是实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在台湾教育转型中出现的现代教育,其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特性主导下产生的,这使得台湾教育能够变传统教育为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教育,从而在转变过程中实现教育的转型。“社会转型、教育转型与人的转型是理论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实践。教育转型的根本旨趣落实到实践环节中,首要的是育人目标的现代转型。”^②教育转型、社会转型十分复杂和艰巨,人的转

① 卢汉龙、吴书松:《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 陈云恺:《教育转型论纲》,《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型更为长久和充满阵痛,在整个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会发生失范或失误,但社会、教育和人的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台湾教育转型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在教育转轨、教育过渡、教育转型和教育的现代性等概念中,教育转型与教育转轨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教育转型作为受社会转型和“人的转型”之必然性制约的一种教育改革,已然呈现出取代“教育转轨”之意蕴的态势。有学者认为,与“教育转型”相比较而言,“教育转轨”存在言不尽意、言不蕴神的缺陷。“教育转轨”所表征和强化的是“轨”的教育思维模式,其特征是权威性、无条件纳入性和不可逾越性;“教育转型”所表征的是“型”教育思维模式,其特征是可建构性和人的主体性。“教育转型”与“教育转轨”之辨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思辨,所反映的其实是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型,教育改革之理论和实践的推进和深入,是对时代呼唤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人作出的积极解释。^①对于台湾教育的重大变化,人们更习惯于用“教育转型”而不是用“教育转轨”来进行描述。

台湾教育转型的起点在哪儿?其初始形态又是如何?以往的研究者对此较少涉及。事实上,在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光复后5年乃至6年间台湾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便孕育着较多的教育转型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逐步被提升和总结,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对台湾教育历史转型的初始形态进行某种层面的梳理和再认识。循着光复后台湾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依照台湾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及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大致可以判定这一初始形态主要表现为:教育的去殖民化、台湾与大陆教育的迅速整合、自由主义教育初露端倪。“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担负着铲除殖民教育制度、改造社会奴化心理、培养人才、促进两岸融合的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建更为艰巨和紧迫。海峡两岸源远流长的教育交流以台湾光复为契机迅速发展,为战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实现台湾文化教育制度祖国化,加快加深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将“去殖民化”作为战后台湾基本的教育政策加以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殖民教育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重建了教育体系,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弘扬打下基础。短短数年间,通过一系列措施,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台湾教育从日据时期的“皇民化”向“祖国化”的转变。如果说,去殖民化教育的推行被视为是除旧的表现,而台湾与大陆教育的迅速整合则是一种布

① 陈云恺:《“教育转型”与“教育转轨”之辨》,《上海教育科研》,2001年第8期。

② 史习培:《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与两岸教育交流刍议》,《台湾研究》,2002年第1期。

新,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衔接。以往的不少研究中,对于布新方面的内容大都冠之以“台湾教育祖国化”这种具有浓厚感性色彩的提法。这种提法较为醒目,易于进行动员和号召,也曾出现在台湾教育当局的一些文件,以及一些知名人士的言论中,反映了试图通过完全移植大陆的教育制度来彻底改造旧的台湾教育的一种急切情绪,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对此应予以充分关注和理解。如果说教育祖国化是一种理念,那么两岸教育的全面整合和接轨则是一种现实的追求,两者并无质的区别。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强化民族和血缘的共通性,缩小两岸在价值意识方面存在的差距,消弭因长期分离而形成的某些隔阂。自由主义教育的初见端倪,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乃至社会意义。在一般人看来,光复后的数年间台湾始终处在国民党政权的强力管制下,二二八事变后至50年代初出现的白色恐怖,更使整个社会处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大背景下,自由主义教育怎么可能出现呢?但是,自由主义教育确实出现了,而且有着一些清晰的轨迹。在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中,人们只要抱着客观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探寻,不难找到其中的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教育去殖民化、与大陆教育全面接轨、自由主义教育初现端倪,这三个层面的教育发展虽处于不同的时空状态,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但彼此间存在密切的衔接和关联,可视为一种自然的递进关系。在这一初始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台湾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相互印证,都获得了合乎理性的充分发展,对日后台湾60余年来所发生的多次教育转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所以,不应只是将这些层面进行自然主义的客观描述,或是加以简单化的解读,而应该深层次地剖析这一时期台湾教育之所以转型的成因,以及转型的历史走向和客观成效。

台湾教育的转型与台湾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社会的转型需要教育进行相应的转型,这就使得台湾教育的转型成为台湾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所具有的配合、适应的特性可以从教育观念的转型中得到验证。教育观念的转型是台湾教育历史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以往的研究者很少对此进行探讨。从台湾教育历史转型的实践进程来看,每一次转型都首先伴随着教育观念的重大转型,新的教育观念的确立往往是进行教育转型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其对台湾教育的转型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是教育转型乃至社会转型的重要风向标。从台湾教育观念的几次大的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社会转型之间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光复后,台湾主导的教育观念从日据时期的“殖民奴化”教育观念转型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这与当时整个台湾社会面临的重大转型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当局认为对教育进行强

力干预是正当的和理所当然的,应大力强化“政治教育”,强调教育为“反共抗俄”服务。由此,在教育决策方面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专制”色彩浓厚。稍微对这一时期威权统治有所了解和认识的人,不难看出教育观念的这种转型,完全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社会的改造所左右,是为维护威权统治服务的。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站稳脚跟,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维护社会安定成为重要的任务。为此,要求教育观念进行相应改变,即从政治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转型为经济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经济规划机关主导着重大的教育政策和决策,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于台湾社会的转型中,不但对经济界,甚至对教育界也产生深远影响。在实践层面,主要体现为提高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以及大力开发人力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更将侧重点置于培养具有开发能力的研发人才方面,而在教育政策的实施方向上重点投资高等教育。6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实现经济起飞,此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为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促使教育观念从经济功利主义向“以人为本”等现代教育观念转型。这一时期,不少新的、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的教育观念,如教育的法制化、教育要为人服务、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要先行、教育的人性化、教育的个性化、教育观念的多元化、教育的科学化、教育的国际化、教育的开放化、终身教育、人才培养的综合化、通识教育、加速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等,在台湾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强化。教育观念更多地转向尊重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凸显人的多样性的价值。通识教育观念成为台湾的教育观念,尤其是高等教育观念的主干部分。教育观念的多元化和人文主义教育观念的大力倡导,促进了教育民主化观念的确立,也促成了教育的转型,大大拓展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为教育事业的充分发展争取到足够的空间。与之相类似的还有道德教育的历史转型。50年代初,社会矛盾突出,民心涣散。当局试图通过制定政策、各级学校开展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方式,实现社会整合,重构精神信仰体系。这一时期的德育,呈现出社会整合与民族认同的显著特点。60年代后期,当局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试图通过规范民众衣食住行,提倡“四维八德”等道德教化,以使生活“现代化与合理化”,德育表现出以传统伦理道德服务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由此,传统道德内涵开始向现代转型。8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权宣布解除党禁,德育浓厚的政治色彩随之淡化,修订的课程内容开始去政治化。教材体系以及教学手段更加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德育回归服务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90年代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德育侧重培养学生“新台湾人”意识,以及兼容并蓄的道德认知和胸怀。德育的内容、方法以及

目标都有了很大改变,但以内化于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以及人本化的特点。从教育理念与道德教育的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教育转型与社会转型确实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的发展水平深刻地影响台湾教育的发展,台湾教育的转型与经济的转型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使台湾当局及私人有可能将大量资金投入教育。据统计,1952年公私立教育经费支出3亿元新台币,占生产总值的1.7%,1986年增至13.87亿元,占生产总值的5.38%。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据统计,198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由1953年的49.88%降至18.25%,而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从12%和20.98%上升到42.62%和39.13%。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促使教育在层次、结构、规模、内容、方法以及目标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和改变,从而拓展了教育的经济功能。^①60年代后期,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对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1968年4月,台湾正式颁布《九年国民教育实施条例》,规定停办初级职业学校,专办高级职业学校。到1970年底,所有公私立职业学校的初级部均已停办,实现了从传统农业阶段的初职为主向初级工业阶段的高职为主的转型。70年代末,职业教育开始出现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的发展趋势。“教育部”于1980年规划《延长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国民”教育实施计划》,自1983学年度开始实施。9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和全面寻求产业升级的阶段,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1996年,台湾“行政院”修正并通过《专科改制技术学院附设专科部设置要点》,以及《遴选专科学校改制技术学院并核准专科部实施办法》,专科学校纷纷改制为技术学院,技职学校的层次结构从以专科为主体向以本科为主体转型。职业教育的这几次转型都与台湾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乃至经济转型本身有着密切关系,一些转型甚至是直接应经济转型的要求而展开的。相类似的例子还有台湾幼儿教育的历史转型。或许有人认为,幼儿教育并不直接为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怎么会与经济转型发生关系呢?实际情况是,在幼儿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时时受到台湾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经济发展较为顺畅的时期,幼儿教育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发展也较为顺利,反之则受到严重影响。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台湾幼儿教育的转型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互动。其中,尤其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幼儿教育

① 杨晓波:《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台湾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与经济》,1995年第1期。

育自身的转型来看,早期为适应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同需要,曾出现不同的幼教观,幼教目标历经数次修订,逐步由社会本位向幼儿本位转型。随着幼儿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促使幼稚园的管理模式由经验式向规范化转型。幼教的发展对师资提出更高要求,1962年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倡导建立灵活、多层次的幼教师范教育制度,要求拓宽幼教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幼教师资建设由保育型向专业化转型。产生这一系列转型的深层次动因,在于台湾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影响着幼儿教育发展的规模与结构,促使幼儿教育历经数次明显转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现代化,以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相适应。

台湾教育转型大致循着改造、移植、创新的路径展开,每一阶段既独立进行,相互间的衔接又较为严密,这可从中小学教育的转型与师范教育的转型中得到验证。在半个多世纪里,台湾积极推进中小学课程改革,不断调整教育规范体系,逐步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期,致力于突出学科中心、加强课程改造,从义务教育强制化、中等教育多元化、劳动教育社会化和教师教育优先化等方面,逐步实现从强调训育向培养适用人才转型。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强调“四育并重”、注重课程衔接,从技职教育专业化、义务教育普及化和人本化等方面,逐步实现从培养适用人才向普及提高转型。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倡导“五育均衡”、加强学科渗透及合作教学,从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条件、受教育品质以及师资培育等方面,逐步实现从普及提高向均衡发展的转型。80年代末期至今,注重综合能力培养,推进课程整合,从教育管理、教师教育、教育改革等方面,逐步实现从均衡发展向多元整合转型。在这些历史进程中,改造、移植、创新始终贯穿其中。90年代以前,台湾的师资培育制度是一元化的,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培养中小学师资。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一元化的师资培养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长期沿用的师范教育体制受到严厉挑战与质疑。^①这使得在师范教育转型方面,改造、移植、创新的特征十分明显。台湾社会奉行“教育为本、师范为先”的原则,一直将师范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在内容上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既有培养规格的提高,也有办学体系的改变;既有养成课程的充实,又有实习制度的改进;既有教师资格审定制的强化,也有职后师范教育的加强。同时,多次颁布较为完备的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法规,这为师范教育的转型提供了保证。1979年,正式颁布“师范教育法”,原先长期存在的“师范学校法”被废止。1982年和

① 陈笃彬、黄江昆:《台湾师资培养的若干特点》,《教育评论》,1999年第3期。

1983年相继制订《师范教育法施行细则》、《师范大学及师范学院学生教育准则》及《师范专科学校学生教育准则》。1994年1月18日,正式通过“师资培育法”。2002年6月,台湾“立法院”几经修改又颁布了“师资培育法修正案”。在此基础上,师范教育逐步实现教育层次从“数量扩展”到“质量提高”;教育体系从“封闭定向”到“多元开放”;培育理念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从“专业化”到“一体化”的转型。可以说,台湾中小学教育转型和师范教育转型,乃至其他类型的教育转型的每个阶段,都是在传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走过了一条从改造、移植,再到创新的渐次发展道路,其中的一些经验值得关注。

在探讨台湾教育历史转型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教育类别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甚至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如高等教育转型和留学教育转型之间的关联度极高,呈现出的便是一种递进关系。研究表明,台湾原有的高等教育体制非常强调一致性和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各个大学和学院无论是招生、学籍、课程、师资,还是学校的组织、运作制度等,都必须依据共同的标准与规定。这虽然可以维持大学教育的基本素质,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个学校的自主发展和办学积极性的发挥。同时,还存在明显的制度过于僵化,无法配合社会发展与变迁需要的缺点。^①半个多世纪间,历经多次转型,台湾高等教育的经营理念、政策制度、功能形态、运作模式等均经过了明显的变革。这些变革是以一系列办学形式的变化、标志性的文件出台为表征。重要的如,1953年第一所私立学院开设,实现了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私人办学力量的兴起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作出贡献。1974年,第一所技职体系的大学院校设立,确立了一般大学和技职教育双轨发展的政策,推动高等教育由精英走向普及。1994年修订的“大学法”,确定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的原则,高等教育经营理念由管制逐步趋于开放,高等教育由单一地注重学究型转向兼顾社会服务功效的发挥。2001年《大学教育政策》报告书的出台,使得高等教育改革开始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呈现出由数量扩充向追求卓越、品质提升的转型态势。在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高等教育逐步由学究型转向兼顾社会服务功效;由精英教育趋向普及教育;办学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经营理念由管制走向开放;办学方式由量的扩张转向追求品质的卓越、提升。以上列举的是高等教育转型的发展轨迹,从中可以看出其成就

① 包海芹、康健:《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改革概述》,《江苏高教》,2002年第3期。

是明显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台湾高等教育的历史转型。从联系、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可以发现其与留学教育的历史转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自 60 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高等教育被视为留学教育的必不可少的预备。这就使得高等教育的转型必然地要考虑留学教育转型这一因素,而留学教育的转型也要以高等教育的转型为依托。众所周知,留学教育在台湾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通过留学教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对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均产生深远影响。台湾的留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经历多次转型,每次转型都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紧密相联,也与台湾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相适应。如台湾公费留学由制度化向弹性化转型,自费留学由精英化向普及化转型,留学生辅导工作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型,反映了台湾留学教育的整个发展脉络,与台湾社会的发展转型相辅相成。同时,顺应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相应地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变革与转型。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及时代的变迁,公费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风向标,是对自费留学的必要补充与引导,体现了整个留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但是,公费留学政策的不稳定性,也对留学生的培养规划工作造成一定弊端。自费留学的普及化,改变了台湾社会的人才结构与层次,但随之出现的“高学历、高失业”和“小留学生”现象值得反思。自费留学的发展,使很大一部分家长和学生将在台湾接受高等教育视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导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一度滑坡,这也是促使高等教育必须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台湾留学教育也在转型过程中,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为实现工业、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腾飞积累了长久动力。显然,台湾高等教育转型与留学教育转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依存性。

台湾教育在转型中,一些教育层面的转型边界并不是很明晰,两种乃至多种教育层面的教育转型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状况,很难将之明确区分开来,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教育制度的历史转型和教育行政的历史转型,其从总体上体现了教育转型的复杂性和相互交融的特征。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可将台湾的教育制度转型划分为教育行政制度、学校制度、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教科书制度等的转型。台湾光复后的一段时间里,教育行政体制变革是从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教育内容、师资培育的变革开始的。一度存在的“意志权力”在教育制度运作方面产生的“强制力”及主导力随后虽然呈现缩小态势,但学校管理仍存在随行政机关政策改变、主导的现象,教育行政制度还没有完全走上法治化的“规则权力”轨道。此后,随着学校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表现为义务教育年限进一步延

长,学校制度延伸开放,形成贯穿于人的一生的一生的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连成一体的终身教育体系,这使得对传统学校制度的改造进一步加速,促进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完善。在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方面,以往采取统筹统支方式。2000年出台的“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明确各级行政机关对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2002年,开始由“统筹统支”向“编列审议”转型。随着民间教育改革运动的兴起,在私人兴学、开放教科书等方面也发生变革,教科书制度开始出现由“统编制”向“审定制”方向转变。几乎与教育制度的转型同步,台湾的教育行政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当然,每次转型的内容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和侧重点。先是教育行政组织由三级向两级转型,接着是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由集权向分权转型。随着1995年“教师法”的颁布,学校资源受管制的局面有所缓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逐步理顺,行政权力逐渐下放,新进教师小范围内采用“自办”模式,教师调任实现解聘制,大学校长任用资格得以放宽。之后,出现教育行政事务处理方式由自办向委办转型,提升了行政事务效率,促进教育行政的多元化发展。最后是教育行政决策运作模式由在地化向全球在地化转型。无论是在教育制度的历史转型中,还是在教育行政的历史转型中,都有着清晰的属于自身的运行轨迹,但彼此的交集也是明显的。如教育行政制度、学校制度的转型都是各自无法绕过的内容,只是相互之间根据现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罢了。至于教育行政中组织架构的精简与高效,更是与教育制度的转型有关,可视为教育制度转型的具体成果。

台湾的教育转型具有普遍性,即具有全面覆盖的特色,而不仅仅限于教育主干部分的转型,这在少数民族教育的转型中表现尤为明显。台湾少数民族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南岛民族”。日据时期,泛称为“高砂族”或“番族”。光复后,一度被称为“山胞”。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与发展,改称为“原住民”及“原住民族”。近年来,在一些大陆学者的著述中,将这类人群称之为“先住民”,与台湾方面所称的“原住民”进行明显的区隔。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将之统称为台湾的少数民族是适宜的。台湾少数民族人口很少,据统计,截至2009年1月底,共有494107人,其中居住在平地的有232762人,居住在山地的有261345人。^① 一般人认为,人口少,教育体量也小,少数民族教育在整个台湾教育中所占分量不会太重,其转型似乎也不太明显,但事实恰恰相反。台湾光复后,至20世纪80年代宣布“解严”止,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少数民族教

① 陈建樾:《台湾“原住民”历史与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绪论。

育也经历了多次转型,而这些转型又是与整个台湾教育的转型相适应的,是台湾教育转型的重要方面。不过,少数民族教育的转型既有教育转型的一般性特征,也凸显了鲜明的民族乃至地域特色,是一个渐进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型的历史过程。50年代初,之所以要求少数民族教育转型,在于当局有意针对少数民族采取全方位的同化政策,推广相关措施是为这一政策的施行服务的。在1951年颁布的《山地施政要点》及1953年颁布的《促进山地行政建设计划大纲》这两份有关少数民族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国语”及“生产教育”特别注重,采用“从山地化教育向平地化教育转型”的教育方针,凸显当局“教育统一”的目的。其后,在1963年颁布的《山地行政改进方案》中,明确提出“促使原住民与一般社会融合”。除要求少数民族教育仍需确立平地化目标外,更着重强调加强汉族民族意识,意在使少数民族教育纳入台湾基础教育的整体体系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为配合“教育融合”的实行,又提出“从平地化教育向整体融合教育转型”。虽然由此导致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消亡、族群认同消失及传统社会结构瓦解,但也在一定层面上提升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水准,加快了少数民族文明开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自身“族群意识觉醒”,使得在教育方面要求实现“从融合教育向多元化教育转型”,体现了整个社会在少数民族教育理念方面日趋成熟、理性与完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人数不多,在教育事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每次少数民族教育的转型都受到台湾社会的极大关注,甚至引发各种激烈论辩。显然,少数民族教育的转型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族群自身的教育诉求使然,更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广泛关注。这表明,台湾教育的转型具有全面性、精致性的特点,变革过后遗留的空白点不多。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当局出于倡导所谓本土化考虑之外,还与台湾的政治生态、社会文化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整个社会对教育发展具有极高期待有关。

在台湾教育转型中,既有宏观形态的转型,也有微观层面的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学科的转型方面,如国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转型便属于这种类型。从1945年光复至今,台湾的国文教育不断发展变化,实现了几次卓有成效的转型。早期,由日语教育转变为汉语教育,加强对国语的推行。此后,主要是沿袭传统,承继以往国文教育的标准和要求,出现重经典、重教师、重灌输、重数量等倾向。从80年代起,对课程标准作出相应调整,力求吸收国际上新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实现从沿袭传统向适应新潮的转型。新世纪以来,力求突破陈规,超越现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科学教育在台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